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6

ISBN 7 - 80149 - 353 - 2

. 中... . 中... . 近代史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 K259.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01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

编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济 春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 号 电话65139963 邮编100732)

网址: <http://www.scl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7.25

字 数:426 千字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9 - 353 - 2/K·035

定价: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张海鹏 (1)
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纷争	
——兼论洪仁 与李秀成之间的关系	夏春涛 (1)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	黄道炫 (17)
英国政府与 1924 年广州商团叛乱	张俊义 (48)
惠栋与清代学术	王法周 (64)
辛亥前戴季陶的政治思想	贺 渊 (108)
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认识	
——章士钊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	邹小站 (122)
张东荪哲学思想的渊源	左玉河 (143)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传播中的	
唯物史观述略	赵利栋 (189)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	罗检秋 (215)
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	
——以戴震研究为例	刘 巍 (236)
从《读书杂志》看中国社会史论战	李洪岩 (273)

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	金以林 (297)
简论北京中法大学	葛夫平 (334)
鼎德方案与哈佛大学的汉学起源	樊书华 (369)
香港社会保障变迁	张 丽 (404)
中国抗战时期人口损失研究之我见	李学通 (415)
侵华日军暴行心理之解剖	卞修跃 (425)
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	王士花 (452)
评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	崔志海 (482)
潘光旦家庭问题研究述评	吕文浩 (525)

序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在我所建所 50 周年时问世，我感到由衷喜悦。这是我所响应李铁映院长号召，建设现代科研院所努力中取得的一点进步。所谓现代科研院所，当然有多种含义和衡量指标。照我的理解，首先是要有优秀的研究人才，要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我们通常所说出人才、出成果，当是指此而言。离开了优秀的人才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所谓优秀的研究所云云，不过是无有之乡。因此，建设现代科研院所，我以为第一位的是要有人才。

50 年来，近代史研究所为我国历史学界培养和造就了几代杰出的学者，他们在发展、繁荣我国历史学园地、提高我国历史研究水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在中国通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奉献了许多令我国学术界关注的著作和论文，编出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资料。不用讳言，这些论著和学术资料对于中国历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这是我们今天迎接建所 50 周年纪念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同样不用讳言的是，我所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多年来，老一辈学者常常慨叹，在近代史研究所，青年人才的成长呈现一种自生自灭的状况。这是说，研究所对青年人才的成长，缺乏有力的办法，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一代一代青年就在这种无奈中或者脱颖而出，或者饮恨出

局。研究所当然不是专业教育机构，不直接负责对人的教育；但是，这并不表示，研究所在教育人、培养人方面不应该承担责任，只能袖手看到这种自生自灭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最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在研究所内培养和造就青年研究人才的办法。我们认识到，在研究所培养和造就人才不同于学校，不能按部就班进行，不能修学分，拿学位（除了攻读学位，而攻读学位，基本上是接受学校教育，不是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每个研究人员都有研究任务，或者是集体课题，或者是个人项目，都在埋头工作。这是基本所情。因此，我们只能在工作中，只能在研究实践中，考察人，观察人，培养人，造就人。离开这一点所采取的培养措施，都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长久，难收实效。通过研究任务，通过课题管理，通过会议切磋，造成激励机制，形成学术氛围，调动和刺激青年研究者的工作热情，推动他们在研究任务中沉下心来，深入下去，开拓各人的科研园地。为此，所里采取过一些办法，如规定新人进所，要求研究室指定老专家帮带，这是老师带徒弟的传统办法；所里制定过青年研究人员考绩办法，成绩优秀的给予奖励，这是以正面表彰的办法，激励青年人上进；积极在所里实行课题制，推动青年人承担课题，所里给予资助；推荐和介绍青年学者出国做较长时间进修、访问，以扩大其视野，提高外语水平；开办青年学者演讲会，每月定期请青年学者作学术报告；积极推动青年学者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讨论会，要求他们撰写合格的学术论文，同时，本所也积极筹措资金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推动青年学者与会。有时也举办所内的学术讨论会，严格按照国际会议的办法，训练所内青年学者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大体说来反映较好。1999 年开始，所里又推出一种新的办法，第一次召开了所内青年学者的学术讨论会。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积极响应，大多数人都撰写了论文。会议严格按照国际会议办

法，只是会议主持人、论文评论人都由青年学者担任。会后，请所学术委员会的老专家给予评议，写得好的论文，评出等次，分别给予奖励。这种做法，在所内反映良好。有的超过了年龄的朋友对于自己不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这次出版的青年学术论坛，就是本所第一届青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为了免俗，我们名之为青年学术论坛。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近代史研究所现有 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将近 40 人，其中博士 16 人，硕士要超出这个数字。有一部分已经晋升为研究员，大多为副研究员。今后若干年，大约会保持这个数字，只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还要增加一些。十年前我们担心的青黄不接的情况，现在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为了使逐年增加的年轻朋友继承近代史研究所的学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初步打算，把这种青年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固定下来，争取每年，或者隔年举办一次，争取每次都出版论文集。青年是我们的未来。研究所的未来在于青年，我国学术界的未来也在于青年。面对 21 世纪国内外学术界的发展，我们要努力推动我们的青年学者尽快地成长，使他们尽早为学术界所认识，所接受，争取使其中一些人成为 21 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名人、大师。为此，我们还要做出更多努力。比如还要在培养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下功夫，使那些即将成为知名学者的年轻人记住、并且发挥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刘大年等老所长留下来的传统，即不仅要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还要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对国家、对社会抱有严肃的责任感。这是我希望，也是我所老一代学者的共同希望。

本书收集论文 20 篇，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发表。20 篇论文涉及近代政治史、中外关系史、教育史、社会史、学术思想文化史以及学术评论方面的内容。作者中有一位研究员、六位副研究员，其他是助理研究员；他们的研究是认真的、努力的，他们在

论文中的表现如何，研究能力与研究方法如何，他们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这就要请各位读者，请各位关心青年成长的前辈们不吝给予指正！

本书各篇论文，在青年讨论会后，又经各位作者修订。本书的编辑工作是本所黄春生、徐秀丽、刘红、曾学白、谢维、杜继东、王立新等做的，我对他们的劳动表示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在很短的时间里出书，我感谢他们的支持！

张海鹏

2000 年 4 月 26 日

于东厂胡同 1 号

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纷争

——兼论洪仁 与李秀成之间的关系

夏春涛

领导层内部的权力磨擦和派系斗争是贯穿太平天国始终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中，由洪秀全、杨秀清之争所引发的天京内讧是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一个转折点，而后期的朝内纷争则是导致太平天国从衰落走向败亡的一个主要内在原因。天京事变的脉络较为清晰，相关研究业已十分深入。相比之下，由于头绪繁多，具体情形扑朔迷离，加之相关史料零散残缺，学术界对后者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且众说不一。洪仁 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总理大臣，而李秀成则是军方统帅之一，因此，他俩之间关系的走向很具有代表性，是太平天国后期朝中党争的一个缩影。本文拟以洪、李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就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纷争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

当初从香港投奔天京，洪仁 寸功未立便被族兄洪秀全赐封为王，委以总理朝纲的重任，这引起了包括李秀成在内的一班功臣宿将的不满。洪仁 见众人不服，恐军心散乱，便具本屡辞。洪秀全降诏抚慰，谓“风浪暂腾久自息”，并准洪仁 保奏，封陈玉成为英王，后又加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从而安

抚了这班武将。至此，太平天国新的领导中枢大体确立，且诸王“各有奋兴之志”。就李秀成来说，他在受封之后，当即具禀向干王“求示以行征之策”，旋又“踵府三次求教当攻取之策”。洪仁以《兵要四则》作答，并向李秀成面授机宜，主张以“围魏救赵”之计打破敌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李秀成依计行事，在其他主力的策应下，于1860年5月大解京围。此后，在登朝商议下一步作战部署时，陈玉成力主解安庆之围，李世贤建议经略闽浙，惟独李秀成附和洪仁，主张乘胜东进，先攻取长江三角洲地区，然后再沿江上取。在得到天王首肯后，李秀成率部东征，一路高歌猛进。在兵临上海外围后，他又忠实执行了洪仁的新外交政策，主动与上海的各国驻华公使进行沟通，申明太平天国的友好态度，试图在进占上海一事上赢得对方的理解和合作。总之，尽管李秀成当初曾对洪仁受封一事表示不服，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相反，李秀成在受封为王后，一时间对洪仁还颇为尊重和听命。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在1860年春夏之交重整旗鼓，二破江南大营，并开辟出苏福省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将相之和。

上海之役是洪、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1860年7月中旬，洪仁亲自来到苏州进行外交斡旋，诚邀各国驻沪领事就太平军进占上海一事进行磋商，但对方丝毫不予理会。眼见外交途径交涉无望，李秀成便直接发兵攻打上海，结果被英、法军队击退。

苏州之行无功而返是洪仁总理朝政期间的一大败笔。在《资政新篇》一书中，洪仁曾详列与他“相善”的22个洋人

《洪仁亲书“自述”》，见王庆成辑校《洪仁亲书自述、诗句》，《近代史资料》，总92号，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

《洪仁在席宝田军营亲书供词》，《近代史资料》，总92号，第76页。

的名单；他在行前写给李秀成的信中也自称与外国诸大臣“素有交情”。这使得太平天国上下均对洪仁 的苏州之行抱有厚望，如天王便认为他“必能和酌妥议通商和好章程”；与洋人交涉未果的李秀成更是翘首巴望着他的到来。然而，由于列强以武力协助清军防守上海的态度异常强硬，洪仁 的外交努力未能奏效。这一结局虽是无法规避，但毕竟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从而影响到洪仁 在朝中的威望。他与李秀成之间也随之嫌隙日深。

在兵败被俘后的供词中，洪仁 对李秀成颇多批评，其中谈论得最多的便是上海战役。干王共在三篇供词中提到此事，认为之所以上海未下，皆因李秀成一意主战，惹恼了洋人。他说：

我天王……乃降诏令余往苏邀洋人来会，颇能如议。而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而忠王遂发师进取，见是空城，遂掠取洋楼物件，被洋人伏兵杀起，出其不意，败回苏城。此刻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

那上海本有夷人，伪忠王带了二千人想破上海，被夷人空城计败回。伪忠王于庚戌年五月破苏州，小的想与夷人和好，亲到苏州。夷人因闻伪忠王有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话，以致不能得上海。

我本想与外洋连和，取武汉、荆襄，扼得全个长江，再由四川下陕西东向。那李秀成偏要与洋人为难，我将洋官都

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洪仁 在席宝田军营亲书供词》，《近代史资料》，总92号，第77页。

请来苏州讲和，被他闹散了。

洪仁 以上所言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实际上，李秀成一直在进行外交努力，始终无意与洋人兵戎相见，乃至在遭到对方袭击后未予还击就撤离了上海。反过来讲，列强在上海问题上丝毫不肯让步，无论太平军是和还是打，他们都不会拱手出让上海。就此而论，上海未下，其责任并不在李秀成。从文意上推测，在洪仁 斡旋无望的情形下，李秀成执意发兵攻取，这可能便是双方产生争执的由来。洪仁 称李秀成是被洋人用空城计败回，说明他对此役的经过不甚明了。与洋人闹翻本是洪仁 力图避免的局面，而李秀成正是这次军事行动的统帅，洪仁 自然会认为后者难辞其咎。而李秀成也难免会对洪仁 苏州之行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和不满。在被俘后所写的供词中，李秀成对洪仁 明显流露出不服和不屑，说他“初来封长，又研才情”，“封过后未见一谋”，当是意有所指。这说明围绕上海未下的责任，洪、李两人曾互有抱怨，将相失和已渐现端倪。

李秀成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英王陈玉成，另一重要将领侍王李世贤则是他的堂弟。而洪仁 在太平天国原本资历甚浅，根柢不深，一旦失去拥有军队和地盘的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其新政的推行便更加显得力不从心，他在朝中的地位也随之开始发生动

以上分别引自《洪仁 在席宝田军营亲书供词》、《洪仁 在南昌府问供之二》、《洪仁 在江西抚衙供词》，见《近代史资料》，总92号，第77、81、83页。按：“伪忠王”等语气系清吏录供时所擅改。

遵王赖文光的看法与干王相近，但措辞远比后者严厉。他批评忠王“该不知机，违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上海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义”，认为“败国亡家，生死皆由此举”（《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8页，中华书局，1979。）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按：“研”系粤语方言，作“没有”解。

摇。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正验证了这一点。

同年11月19日，洪仁 在天京与来访的中国第一位留美毕业生容闳举行会谈。容闳根据旅途中对太平天国的观察，向自己的旧友提出了7项改革建议，内容包括改组政府和军队、推行西式教育等，并表示愿为太平天国效力，以促成这些改革。然而，当双方再次会晤时，干王一脸无奈地向容闳表示：他深知这些举措的重要性，但其他各王均在外征战，在他们没有返京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任何举措在付诸实施之前，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首肯。容闳这才对洪仁 的处境有所了解，意识到“他是孤单的，没有人在倡导这些改革方面向他伸出援手”。实地考察后的容闳不禁大失所望，转而对太平天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确信太平天国既不能革新中国，也无力复兴中国”。于是，他最终谢绝了洪仁 的任命和挽留，重新回到了上海。洪仁 身为总理大臣，却始终不能对容闳的建议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表态，不得不顾忌到其他各王的态度，这足以说明他对诸王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事隔两个多月后，幼主洪天贵福于1861年2月4日降诏，下令废止前之本章依次传盖各王金印后递达幼东王转献的制度，改设殿前正副赉奏官；次日，又宣布新颁的本章进献制度“永以为例”，“自今内外本章免盖 叔金印及一概金印，单准盖幼东印”。幼主就此解释道：“自今免盖 叔印，恐人起议踵东王。爷排东王乃？世，免盖各印理事张。”另以抚慰的口吻说：“至 叔总理，仍如前也。”从此，洪仁 虽然名义上依旧总理朝政，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1909), pp. 110、123.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75~77页。按：“？”系太平天国新造字，“乃？”作“提携”、“帮助”解。

但已经无权决定文武百官的奏章能否递献天王。幼主此诏隐约透露出洪仁 遭人非议的信息。为了保持上帝教神学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洪秀全在石达开离京出走后，很快就替杨秀清恢复了名誉，后来又将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他，使之袭东王爵位，成为幼东王。幼东王尽管还是个幼童，但毕竟承袭了前之东王的地位，按照昔日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的定制，理应序列群臣之首。于是，有人便以“爷排东王乃？世”为借口，私议干王权倾一时，取代或排斥了（幼）东王的地位和权威。这大概便是幼主诏旨中“恐人起议踵东王”句的由来。该诏虽然是以幼主的名义发出，但从其重要程度来推断，必定经由洪秀全一手裁定，反映了洪秀全对洪仁 态度的微妙变化。

紧接着，同年2月9日，即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年）元旦，天王洪秀全又诏令洪仁 外出催调兵马救援安庆。洪仁 原本是个书生，又肩负总理朝纲的重任，此刻离京出征，多少让人感到有些蹊跷。关于个中原委，当时身处天京的英国翻译官富礼赐（R. J. Forrest）透露说：“他不是军人出身，因此，在外征战的其他王爷对他一直呆在京城十分嫉妒。他甚至被迫离京出征，但搞得一团糟，后被告知番鬼正在南京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这才从前线匆匆返回。” 洪仁 后来在供词中亦云：“那广西老贼都是开国的功臣，各顾自己，不顾大局，见小的言语公正，都想推小的出京。” 可见干王此番出征是受他人排挤所致。

上述事实说明，自上海战役后，洪仁 在朝中的地位开始日渐下跌。有论者认为，洪仁 处境不妙，主要是受王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的排挤所致。这种推测与史实不符。太平天国后期的

T. W. Blakiston, *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 (London, 1862), p. 50.
《洪仁 在南昌府问供之二》，《近代史资料》，总92号，第81页。按：文中语气系清史记录口供时所改易。

朝内纷争错综复杂，扑朔迷离，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陈、李与洪氏宗亲之间，包括洪氏宗室成员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或嫌隙，这在现存史料中均斑斑可考。不过，从总体上看，由于“血浓于水”的缘故，洪仁 与王长次兄几乎是休戚与共，洪氏宗亲与李秀成等异姓诸王之间的权力磨擦才是当时朝内纷争的核心问题。

约从1860年下半年起，以血缘和利害关系为纽带，李秀成等异姓诸王和王长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员逐渐成为朝中分庭抗礼的两大派系，李秀成与洪仁 之间也随之成见日深。就李秀成而言，除堂弟侍王李世贤外，与他结为奥援的还有章王林绍璋。林绍璋系广西老兄弟，1854年因湘潭丧师革职，1858年经李秀成保举出任地官又副丞相，1860年封章王，协助洪仁 料理朝政。上海之役后，洪仁 在朝中主要受到李氏兄弟和林绍璋三人的掣肘。天历辛酉十一年冬，洪仁 具本弹劾对安庆失守负有直接责任的军中各主要将领，结果触怒天王，由此引发了朝中走马灯似的人事更迭。据洪仁 后来回忆，洪秀全先是将干王、英王、章王等人相继革职，一并问罪；未几恢复了洪仁 的王爵，但未复军师一职；紧接着，天王又恢复了林绍璋的爵位，“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预）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但到了壬戌十二年（1862年）春，天王又将林绍璋撵出京城，重新起用洪仁 掌政。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洪仁 几度沉浮，朝内人事更迭频繁。朝中党争之激烈，于此可略见一斑。

在被俘后的供词中，李秀成一味贬低洪仁 ，认为干王所撰刊的书籍不值得一读，只字不提他在主政期间的建树，并直斥王长次兄为“佞臣”，列数其鬻官纳贿、搜刮民财、玩弄权术等种

《洪仁 签驳李秀成供文书》，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拙文引据王庆成先生所提供的影印件，题名由王先生所拟，下同。

种劣迹；相反，却对林绍璋大加赞许，认为他“聪明，样样晓得，能勤劳”。忠王还愤愤不平地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其驸马，第五重用英王，第六才轮到他李秀成。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洪仁 在供词中着重点名批评了李秀成和林绍璋两人，除责备忠王在上海事件中“不依所议”、“究不肯认错”外，另指责章王在顶替自己主政期间为人“奸猾”，“凡事瞒上自专”。及至从清江西巡抚沈葆楨处看到曾国藩刻《李秀成供》后，他又就其相关文字签附反驳意见，申辩幼西王、王长次兄等人爵位虽然尊显，不过是天王对亲臣和功臣之后的荣宠而已，但兵粮之权归忠王总握，“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洪仁 还直斥林绍璋是“佞人”，说他在安庆保卫战中“弃江北不守不战”，在朝中“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至于被李秀成斥作“佞臣”的王长次兄，洪仁 则视之为“忠正人”，并指责忠王、侍王、章王三人结党营私，谓“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不认王长次兄为忠正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王长次兄和章王的为人与政绩，李秀成和洪仁 各执一词，评价各异。这从侧面说明李秀成等人与洪氏宗亲平素互有成见，积怨甚深。

(二)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朝中大臣各存私念、心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139、218、257、306、307、328页。

《洪仁 在席宝田军营亲书供词》，《近代史资料》，总92号，第77页。

《洪仁 签驳 李秀成供 文书》。

胸狭窄的因素外，与天王洪秀全在用人上的过失也有很大关系。

天京事变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姓大臣疑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他先是封其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翼王石达开，结果导致石达开负气出走。洪仁投奔天京后，他又很快破格任命其为首辅大臣。后来，他又让自己的儿子洪天佑袭东王爵位，以所谓的“外甥”萧有和掌内外本章是否转献之权，另改封长次兄为信王、勇王，封堂兄洪仁为恤王，并重用驸马钟万信、黄栋梁和他的一群侄子。在天王于辛酉十一年四五月间颁发的几道诏旨中，洪氏宗室成员在受诏人名次的排列顺序上均赫然排在英王、忠王等异姓诸王之前，其亲疏厚薄十分明显。平心而论，洪氏亲属中除洪仁才堪大用外，其余或过于平庸，或年幼无知，大多不胜其任，其结果不但与事无补，反而加剧了异姓大臣的离心倾向和抵触情绪。而此时的洪秀全专注于宗教，无心亲理政事，遂使这一局面愈益失控。李秀成在其供词中再三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用贤才、不问政事，虽言语偏激，但也确系有感而发。

然而，正如洪仁所言，洪氏亲属尽管地位显赫，但并无一人握有兵权和地盘，而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与前者抗衡的资本。洪秀全一心想营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终对异姓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时却又不得不在军事上借重于后者，这是他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两者之间搞些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孤傲而又刚烈，本不擅长协调人际关系，更谈不上熟谙权术。因此，他在处理朝内纷争时往往过于偏执和意气用事，导致对群臣驾驭不力。由洪仁弹劾事件所引发的频繁人事更迭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此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既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无法起到笼络、凝聚人心的效果，相反，只能促使原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正是由于在用人思路上的摇摆不定，洪秀全远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无论